

## 《中国货币理论史》评介

鄧 远

中国古代货币思想有着十分丰富的理论内容。最近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货币理论史》(上册)(贵州省金融学会组编、叶世昌编著,以下简称《理论史》)对此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该书除了在史料搜集、体例安排和写作风格上具有特色外,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学术见解,主要体现在作者对古代重要货币思潮、著作、人物和特有货币概念的分析中。

《理论史》作者对中国古代有没有货币数量论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曾有学者把《管子》书中的有关论述称为货币数量论,《理论史》则明确指出:“《管子·轻重》中有一些货币数量影响物价的例子,但都是特殊情况下的例子”;“《管子·轻重》并没有讨论正常条件下货币数量和货币购买力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把商品价格的形成和变动原因仅仅归之于货币数量。”<sup>①</sup>古代思想家主要是针对不足值货币而发表货币数量影响物价的议论的。基于中国古代钱币流通的特点,《理论史》在谈到唐代陆贽的货币公式时同样强调其与西方货币数量论的区别。陆贽曾说:“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陆宣公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条》)。《理论史》作者称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货币数量论的典型公式”,“决不能将它和西方资产阶级论述贵金属流通的货币数量论等量齐观。”“我们既要看到其中的理论错误,也要承认铜钱流通数量的变动容易影响物价的事实”(第74页)。

任何货币思想的产生都有其客观经济基础,尤其是形成连绵不断的社会思潮,更有深刻的货币流通方面的根源。中国古代的金属主义理论倾向出现得很早。金属主义坚持货币必须由贵金属充当,忽视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社会性。但是中国历史上的金属主义理论往往是封建思想家用来反对通货贬值和通货膨胀的武器,如果不联系封建统治者凭借权势滥发货币的历史事实,就很难看到这一点。《理论史》作者既指出金属主义的理论缺陷,又

肯定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反映人民意愿、有利于稳定经济的积极意义,避免了理论分析脱离历史实际的偏颇。

在浩瀚的古代典籍中,有关货币的言论大多零星散乱,有些甚至仅存片言只语。相比之下,那些论述集中、史料丰富的文献对今天的研究来说更显其宝贵和重要。对此,《理论史》作者不惜笔墨,进行重点分析阐述。例如对《管子》一书,作者将它分为战国部分和西汉部分两节加以论述,而其中精彩的理论分析是在西汉部分。作者把《管子》(西汉部分)的货币观点放在《管子》轻重理论中加以考察,用了不少篇幅阐明了有关货币数量论问题,而且还澄清了前人所作的《管子》中有货币流通必要量的结论。

清代王鏊所写的《钱币刍言》(包括续刻、再续)是一部古代货币理论专著,它的价值不仅在于集自宋至清重要钞币理论于一书,更主要的是它把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名目主义货币学说发展到了顶峰。《理论史》作者早在60年代初曾著有《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其中对《钱币刍言》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在《理论史》中,作者仍然把它放在比较突出的地位论述。作者指出王鏊等同纸币和金属货币的谬误,认为“不是根据流通需要,而只是根据国家的财政需要无限制地发行纸币,这就是王鏊行钞主张的实质”(第222页)。针对王鏊所说国家权力能规定纸币价值,作者指出:“历代纸币流通的实践早已充分证明了这一说法的荒谬。过去主张行钞的人,没有一个人敢于说靠政府命令能使纸币按规定价值流通而不贬值。只有王鏊,才敢于下这样可笑的结论”(第223页)。为了深刻剖析王鏊货币思想的实质,《理论史》专辟一目,探讨了王鏊货币理论形成的主观原因。

<sup>①</sup> 《中国货币理论史》(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3页。以下凡引该书,均只在引文后注页码。

这在该书其他章节中是没有的。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夔提出行钞主张，着眼点主要不是在于白银外流，而是在于有感于当时存在着的深刻的社会矛盾。”封建社会末期的种种弊病和危机，“王夔认为都可以通过发行纸币来解决”（第227、228页）。王夔作为一个封建思想家的行钞理论有其直接服务于最高统治集团的目标，即所谓“足君犹先”。《理论史》尖锐地写道：“既然‘君足而后民足’，那末发行不兑现纸币来搜括民间财富就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了。给行钞加上这样‘冠冕堂皇’而又这样露骨的前提的做法，是中国历史上所仅见的”（第235页）。这就揭露了封建货币思想的阶级特性（王夔的观点只是一个典型代表而已）。不无巧合的是，对《钱币刍言》一书的重点剖析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古代名目主义货币理论的批判总结。

在中国古代货币理论史上，有一些特有的货币概念值得注意和研究。充分肯定这些理论概念的价值，有助于弄清货币理论史的发展脉络，确立中国货币理论史的世界地位。但只有理清这些特有概念的本来涵义和演变过程，才能作出恰当评价，否则就难免把古人的思想现代化。《理论史》对“称提”的分析就很注意这一点。“称提”意为提高。根据《理论史》作者收集的资料，它是在北宋以后使用较多的一个词汇。例如：北宋哲宗元符2年（公元1099年）有以下命令：“令诸路经略安抚司限半月密切具利害，合如何措置。可以称提铁钱稍重，物价稍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二二）。这里的“称提”指提高钱价。南宋董煟的《救荒活民书》卷二中说：“和籴本谷贱伤农，增价以称提之耳。”这里“称提”指提高谷价。南宋有些人又以“称提”表示提高纸币的币值，如沈该、袁燮（参见《理论史》第127页）。“称提”作为一个术语固然值得一提，但如果将它概括为宋

代的纸币管理制度或理论原则就不妥当了。由于“称提”纸币的方法并不限于兑现，因此说它是兑现纸币管理上的系统理论，无疑是拔高了古人的思想。

另一方面，对古人思想中的科学因素也必须敢于肯定。例如明代思想家丘濬在谈到货币价值问题时曾有一段议论，其中涉及到抽象劳动（功）和价值创造的关系。他说：“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大学衍义补·铜楮之币下》）。这显然是指劳动耗费的多少决定商品价格的高低，具有朴素劳动价值论特点。对此，作者也联系货币理论进行了评价，指出：“这样联系劳动耗费来说明商品的价格，是非常难得的。但是用等价交换原则来说明纸币流通的不合理，在货币理论上却并不正确，因为纸币可以代表一定的价值同商品进行等价交换”（第174页）。

此外，关于中国古代货币铸造权的争论，《理论史》认为共发生四次。第一次是在汉文帝5年公元前175年，贾山、贾谊都反对自由铸钱。第二次是汉昭帝始元6年（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上的争论。第三次是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公元451年），沈庆之主张有控制的自由铸钱，颜竣反对。第四次是唐玄宗开元22年（公元734年），反对自由铸钱的人较多，以刘秩的理由最为详细。这一概括性的划分在货币史论著中还属首次。

《理论史》的某些观点可能引起争鸣。但是，作者严谨、开拓和深入的论述将会对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读者也可以从中获得丰富的历史理论知识和有益的启迪。

1988年4月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金融出版社图书编辑部）